

“三个面向”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

——纪念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发表 15 周年

□厦门大学高教所 / 邬大光 / 刘振天 文

1983

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下简称“三个面向”)。“三个面向”理论的提出,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三个面向”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世纪之交,重温邓小平的“三个面向”理论,深刻认识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赋予高等教育的使命,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的“三个面向”理论之所以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和指导方针,就是因为它把握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审时度势,科学地预见世界教育走向和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三个面向”中,面向现代化是基础,面向世界是条件,面向未来则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方向。面向未来,提示了教育的基本属性,即教育自身的未来性。只有从面向未来的高度来理解“三个面向”理论,才能真正把我国教育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活动,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其重要性不断地为人们认识和发现。在农业、手工业和工业化时代,学校长期被认为是保存和继承人类知识的场所和机构,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复现”人类已有的文化遗产。教育的这种对文化遗产的复现、继承作为教育的基本特性之一,它在社会的延续与进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人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教育的文化复制和传承上,就会成为社会进步阻碍因素,使历史处于简单的循环之中。在当今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对教育面向过去、“述而不作”的陈旧思维定势的局限性已有所认识,在肯定教育的文化“传承”性的前提下,愈益重视并开发教育面向未来,创造未来的功能。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功能和高等学校职能的不断拓展,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传统看法。例如,高等学校从单一的教学机构逐步向产、学、研一体化的趋势演变,从单纯的保存知识的场所向现代的“知识工厂”转变,从传统的“象牙塔”向现代社会的动力站转化,从单纯的科研机构逐渐朝高新技术的“科学园”方向转变,等等。这些变革正在使高等学校由社会的边缘走向或成为社会中心,也因此使得人们对高等教育本质和价值产生新的认识。所有这些变化集中展现了高等教育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那种超越自我、追逐未来、创造未来的品格。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未来也需要教育来创造。谁把握住了教育,谁就因此拥有未来。

高等教育面向未来,就是面向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面向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时代。“一种由知识驱动的经济必然要有一种产生知识的环境,而这样一种环境只有靠大学的存在才能形

成。”这是对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地位认识上新的升华,它深刻地提示了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社会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所做的各种准备中,人才和教育是最重要的准备之一,而其中的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又处在整个准备过程中的关口上。

知识经济理论提出后,有人把它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理论,也有人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形态。既有人从高科技的角度探讨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也有人从信息技术和智力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来描绘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理论的提出,从本质上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它是对影响社会发展因素的一种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即人类社会正从以物质资源的社会发展因素向以智力资源作为主要发展因素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力量将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前所未有的张力体现出来,教育的作用将被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知识的价值将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展现在人类社会面前。

面对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正以极大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对此进行着种种前瞻。人们试图彻底拨开知识经济时代的面纱,为知识经济的到来做好各种战略性准备。目前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无论知识经济是以何种具体形态和何种“知识型产业”为支柱出现,都离不开教育的充分发展和提高。重视教育,重视人才,重视学习,这是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知识经济将是一种教育型经济和学习型经济。正是根据这样一种预测,人们才不难理解,为何新加坡在亚洲金融风波冲击之后,削减各方面开支,唯独把教育经费增加 20%,以保证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能力和重整金融风波冲击后的经济。也正是基于对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作用的充分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早就指出:“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教育领域”。为了迎接教育领域的挑战,他呼吁世界各国在 2000 年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6% 用作教育经费支出。

知识经济理论对教育的关注与重视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人们普遍注意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以及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仅仅单纯地表现在经济领域,同样也体现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伴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存在着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知识差距和教育差距。经济差距与知识差距和教育差距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关系,可以说,教育差距既是经济差距的结果,又是经济差距的原因。这种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世界银行 1998 年公布的年度报告,明确指出了知识差距和教育差距对经济差距的影响,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整体的知识和教育差距中,仅就大中小学三级入学率估计,“在小学阶段

要落后 10 年,在中学阶段的差距是最为主要的差距。因此不难推论出,高等教育间的差距可能对知识差距和经济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所指出的:“在一个社会中,高等教育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它既是知识保管者,又是知识创造者”。“在智力资源作为发展因素与物质资源相比越来越占优势的 未来社会,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性必然会日趋增加”。1997 年 10 月英国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已经把大学称作“知识工厂”,认为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创造源、人才的培养库、文化的传播者,也将是知识的增长源。这一认识为人们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价值提供了最好的诠释。所以,高等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在知识经济时代将处于核心的地位。

在整个人类社会 发展过程中,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会带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而每一次变革几乎都是针对大学天然的适应性和保守性的。由于大学教育机构的天然保守性和适应性,往往使大学表现出与社会快速变革间的距离,大学发展的滞后性则成为整个社会变革中的一曲不和谐音。知识经济的革命性特点,必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有人预测最终将体现为一场知识革命,由此引发一场教育革命。尽管目前人们对知识革命引发的产业结构与经济活动的特征还缺乏十分明晰的展望,但其基础必定是建立在智力资源尤其是教育和人才资源之上的论断将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说,教育的适应性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可能失去其以往存在的基础,而它的超前性和先导性有可能成为主要的特征。

“三个面向”理论作为对教育基本属性的高度概括和教育发展战略的一种宏伟设想,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更加显示出其明确的指向性和更深远的义蕴。教育面向未来,就是要面向知识经济,推动、促进和引导知识经济的发展。如果说在农业、手工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处于缺乏紧迫感和现实感的外部环境之中的高等教育,其面向未来只是作为自身的一种主观愿望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紧迫感和现实感则严峻地摆在高等教育面前。

中国,整体上虽然落后,但离知识经济并不遥远。抓住机遇,发展知识经济,有可能大大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高等教育必须为发展知识经济做好准备。

第一,高等学校必须把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培养创新精神的人才,这是知识经济的本质特点决定的。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崇尚创新的时代。江泽民同志最近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知识经济,是一种目前暂时还无法全面预测的崭新的经济形态,它将从根本上摆脱人对自然力以及对物的过分依赖,转向对知识、智力的运用和开发,知识和智力成了生产和财富的决定性条件和资本。而这一切,最终将通过人才对知识和智力资源的掌握来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在本质上是人的精神和能力的创新,是教育的创新。高等教育面向知识经济归根到底还是依赖于人才,尤其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科学研究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大学发挥“知识工厂”和思想库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现。但这种作用,归根到底还要通过人才库的能量释放来实现。只有培养一大批高水平人才,才能参与国际背景中的知识经济竞争。然而,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践中,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仍显薄弱。在许多方面,例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教学思想、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利于甚至限制、束缚大学生创造精神、创新意识和能力养成的消极因素。如果不在根本上转变陈腐落后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固守于旧有模式,要培养面向未来,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是不可能的。

第二,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全面深入贯彻邓小平“三个面向”思想,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做好制度上的准备。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主要包括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三个方面。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制系统。在整个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而在体制改革中,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和办学体制,其地位又不完全等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指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管理和监督方式,主要是反映国家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办学体制主要是指高等学校与举办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不同的办学主体之间所形成的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投资体制主要是指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运作方式。相比较而言,办学体制更加重要。因为办学体制是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对高等教育发生影响和作用的桥梁。也就是说,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影响,必须通过办学主体的参与才能完成,任何完善的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都必须在办学主体的有效行为中才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管理体制 改革成效比较明显,中央、地方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理顺,大学获得了某些自主权。但是,许多问题依然困扰着高等教育。究其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还没有深入到办学体制改革层面上来。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改革不只是权力划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什么途径建立一个灵活高效、多样的办学系统,实现办学主体多元化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能否实现大发展,质量大提高的关键所在。纵观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样化是改革和发展的大趋势,国家办学、地方办学和私人办学并举,由此导致投资渠道多元格局和质量多元格局。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一元办学观念和质量观念,加快办学体制改革,把一个具有生机和活力的高等教育带入 21 世纪,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第三,树立高等教育的质量意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

就世界范围内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从单纯追求数量扩展转向提高质量的新阶段。质量问题成为 21 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我们常说未来社会的经济竞争、科技竞争是教育的竞争,实质上是教育质量的竞争。如果把质量从教育中抽出去,教育“发展”规模再大,数量再多,也无多大意义。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最终产品,树立高等教育的质量意识就是树立培养和造就高质量人才 的意识。高质量人才,表现于结果,形成于过程,所以,提高人才生产过程质量又是提高产品质量的根本保证。贯彻邓小平“三个面向”理论,就是要把教育质量始终摆在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心位置上。必须树立全面质量意识,包括要建立一个民主、高效的高教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育、科研和管理队伍,建设优质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以及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等等。总的说来,提高质量应该落实到高等教育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之中。但是也要突出重点。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该下大气力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大学,这是关系到中国能否担当起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参与国际知识经济竞争、把自身带到 21 世纪强国之列的大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不可回避的选择,也是落实邓小平“三个面向”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抉择。当今世界强国,无一不拥有世界闻名的一流大学,正是由于这些一流水平的大学,才使其在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发展诸领域雄居世界前列。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发出了建立一流大学的响亮号召,这是我国高等教育面对知识经济挑战的有力回应。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一系列改革,已经为创建一流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不懈努力,是可能而且必定能够建成一批一流大学的,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责任编辑:王秀花)